

## 看展去



▶ “文艺理论小丛书”

文学史上的新写法,即“文人剪影”系列;可与唐旻的“晦庵书话”系列双峰并峙。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赵先生对于“昆大班”的培养、上海市戏曲学校的发展,对俞振飞戏曲事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作用。这里说一则“一车三虎”的故事:

赵先生1984年对我笑言,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他和俞振飞、周凤璋三人同乘一辆轿车外出。上车不久,谈笑间,他突然想到“我们三人都是1902年出生,都属虎,都恰巧八十岁了,真是太巧了!”他忍不住笑着对大家说:“今天我们一车三虎,都是八十岁的老虎,非常难得!”俞振飞和周凤璋闻言,都笑了起来。这一车三只八十岁的老虎,都是戏曲界的中流砥柱,赫赫有名,虎虎生威。如今国宝级的“昆大班”,是赵先生和俞振飞等人一手培养的。

——周锡山(赵景深弟子)

赵老师是我的恩师。当年每周一次在赵老师家中上课,每次就在他家三楼一张长方形大桌子旁。当时赵老师年纪已经很大了,80多岁,身体也不好,但因为他要给我们上课,专门准备讲稿《中国戏曲史》。他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新的想法,一方面是对过去戏曲研究的总结,一方面也在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当时在赵先生家上课,其实就是一个文艺沙龙,赵先生本人也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样一种传统的雅集式氛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赵先生教导我们要五种爱心:乐于献身的爱心,锲而不舍的恒心,排除干扰的专心,取长补短的虚心,慎于下结论的细心。赵先生还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对我来说,终身难忘的还有赵先生身上的一种温情。

——陈建华(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复旦大学图书馆因为接受赵景深夫妇捐赠的戏曲小说类古籍,所以对赵先生一直很感恩。从古籍善本的角度,赵先生的藏书中没有很多“版本书”,但那些从民间旧书摊上捡漏得来的手抄本很珍贵。

对于不少戏曲、小说、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研究者而言,最关注的尚非大家耳熟能详的戏曲小说名作,而会更关注以前民间小戏班子艺人们说唱的手本。赵先生积数十年之功,所收集的手抄本大多是这样的本子。尤其难得的是,他在通俗文学的资料收集方面,已形成一定的气候和规模,比不少图书馆搜集的还要丰富。很多海外学者,如日本的学者,对这些本子非常感兴趣。这是赵先生捐赠藏书中的重头戏。

——吴格(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本文为纪念赵景深先生主题研讨会发言实录。特别鸣谢:杨翼然

## 赵景深先生的藏书

■ 陈丙杰



▲ 赵景深像 万籁鸣剪影

近日,“书中景深——赵景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出。本次展览由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社科院共同主办,精选赵景深先生的藏书95册,以展现这位作家、编辑、戏曲与民间文学研究者的人际交往、文化贡献和人格魅力。

赵景深长期担任北新书局总编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生前藏书三万余册,涉及民间文学、现代文学、戏曲小说等领域。他去世后,家属属愿将藏书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赵景深也是2018年首批“上海社科院大师”之一。策展人陈丙杰特别撰文,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6月25日。



赵景深(1902—1985)一生都在和书打交道。作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戏曲和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他一生著、编、译的书约有150余种;作为北新书局、开明书店总编辑,他策划出版过大量文学和学术著作;作为藏书家,他的藏书鼎盛时期多达3万余册。

以往人们多关注赵景深藏书中的古籍善本,但作为亲身参与新文化建设的文化名人,最能体现赵景深在新文化方面的贡献的,恰恰是他保存下来的平装书,尤其是其中的民国图书。在这些书中,有他早年出版的著作,有友人赠送的签名本,有他自己收藏的罕见本和名人签名本,也有他作为主编出版过的友人著作,以及留有他手迹的批校本和题跋本,还有他专门收藏的鲁迅、周作人、胡风等人的著作。这些藏书是深入了解赵景深文化活动和人际交往的重要文献,更是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窗口。

一《荷花》——  
“以显出我作风的清淡”

在赵景深自己的百余种书中,如果要选择一种展现赵景深个性人格,诗集《荷花》无疑最具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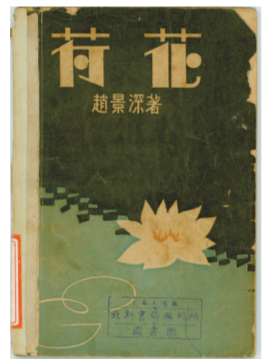
《荷花》1928年6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发行,1930年10月再版。赵景深在自序中说:“我的诗歌缺乏狂躁的热情,所以题名‘荷花’以显出我作风的清淡。”其实,“清淡”不只是他的诗歌风格,也是他文学评论的价值倾向,比如,

他认为周作人的诗“极清隽”,朱湘的《草莽集》“清丽柔婉”,读冰心的《繁星》“如饮清凉芬冽的泉水”。而事实上,“清淡”也是赵景深个性的隐喻。

《荷花》封面由书画篆刻家、同时长于书籍装帧的钱君匋设计。钱君匋也是赵景深在开明书店工作时的同事和好友。钱君匋不只为《荷花》设计封面,也评论过《荷花》。可以说,不论对赵景深的诗歌,还是对赵景深的个性和人格,钱君匋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把他自己对《荷花》的理解和对赵景深的期待融进了封面设计中。封面的主体是一朵雪白的荷花,背景则是黑色和绿色两种泾渭分明甚至相互对峙的色块。构图中的黑色让人联想到1927年之后国民党高压统治下黑云压城的时代氛围;绿色则代表荷塘的脏水,容易让人想到闻一多在《死水》中说的“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荷花就处在这两种色块的边界处,没有被头顶的黑色熏染,也没有被脚下的绿水污染。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朵“荷花”就不仅仅是钱君匋对赵景深诗歌风格的概括,也隐含了钱君匋对好友个性、人格、价值立场的赞许或鼓励。

值得一提的是,钱君匋一生为赵景深设计的封面不下10种,仅1928年一年就为赵景深的《荷花》《栀子花球》《天鹅歌》(罗亭)4种著作设计封面,其中《荷花》是钱君匋为赵景深设计的第一幅封面作品。

另外,这本书内贴有一张黑色的人物剪影。赵景深在剪影下方题“赵景深像 万籁鸣剪影”。万籁鸣是民国时期剪纸艺术第一人,也是动画大师,1941年与人合作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60年至1964年导演的《大闹天宫》更是荣获第22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万籁鸣终生致力于通过动画艺术为少儿服务,赵景深也致力于通过儿童文学翻译、创作和研究为儿童服务。赵景深将万籁鸣为自己剪的侧影贴到诗集《荷花》内,一方面为我们考证赵景深与万籁鸣的交往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赵景深对这部诗集的珍视。



▲《荷花》封面 钱君匋设计

此书封面还钤有一方“北新书局编辑所图书馆”的蓝色印章,为我们考证这部著作的流传提供了线索。赵景深早年热衷于收藏新学版本图书,后来因为兴趣转到文艺理论、学术研究领域,也因为家中空间狭小,于是在1930年代中期将早年收藏的新学版本图书转移到自己工作的北新书局编辑部(《书采温梦录》)。后因战乱、赠书、借阅未归等各种原因,早年收藏的《春雨》(卢冀野著,初版)、《春水》(冰心著,新潮社,初版)、《茵梦湖》(郭沫若译,泰东图书局,初版)等新学版本早已流失,但也有部分图书保存了下来,比如他在《书采温梦录》一文中提到过的《绿帘》《北国的线》等。从《荷花》封面钤的印章,可初步推测此书所经历的流变:它是赵景深早年新学版本收藏中的一册,曾被置于北新书局编辑部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北新书局和其他出版单位合并,赵景深再次将此书带回家中。



▲▲《战时大鼓词》原封面与赵景深自制封皮

一《战时大鼓词》——  
“摇曳多姿”的毛笔题签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曾持何种政治与文化立场,此时大多放下成见,以笔为枪,投入抗战的洪流中。《战时大鼓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此书于1938年由战时出版社出版。在书中,赵景深暂时放下“清淡”的风格,转而选择大鼓词这种颇具鼓动性的文体歌颂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军队,展示出少见的“狂躁的热情”。

赵景深在序言中说:“新文学提倡了十几年,始终只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与一般民众不相干涉。”可见,他选择大鼓词这种方式,是主动跳出五四新文学传统,思考其如何与民众、时代相结合的理论问题,并积极投身民间文艺的探索。这个作品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温润如荷花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清醒选择,由此也不难理解赵景深从《荷花》到《战时大鼓词》的创作转型背后的逻辑。

《战时大鼓词》的封面设计采用了写实风格,将在茶楼上喝茶听鼓书的市井风情直接移入封面。赵景深保存的这本《战时大鼓词》原封皮掉了,遂以牛皮纸重新制作封面,又以毛笔题签“抗战大鼓词 赵景深”,并钤朱文名印一枚。赵景深的毛笔字独具风格,用好友徐调孚的话说就是“摇曳多姿,似出自闺秀之手”。“摇曳多姿”的毛笔字加上文人钤印,再配上朴素的牛皮纸封面,让整本书显得颇具文人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赵景深曾对自己早年的作品作过修订。《战时大鼓词》中就有不少修改痕迹。同时,赵景深在修补的封皮上题签时,将题名“战时大鼓词”改为“抗战大鼓词”,多了一份回望时的距离感。这一修改也使得这本书具有了独特的版本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景深藏书中有不少书重新修补过封面,并在新修补的封面上用毛笔题签、署名,但在修补封面时钤印倒是很少见。在赵景深藏书中,仅《抗战大鼓词》在修改后加盖名章。因此,这本用牛皮纸重新装帧,配上赵景深毛笔题签、署名和钤印的小书,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文艺理论小丛书”——  
赵景深与陈望道的交游

“文艺理论小丛书”是时任北新书局经理陈望道策划的一套文艺理论丛书,开本只有16×12cm,全套共5册,

分别是:

## 《艺术简论》

青野季吉著,陈望道译,大江书铺出版,1928年12月10日初版,1929年6月10日再版,1930年4月10日第3版

## 《文学与艺术之技术的革命》

平林初之辅著,陈望道译,大江书铺出版,1928年12月10日初版,1929年6月1日再版,1932年9月10日第3版

## 《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

平林初之辅著,方光彦译,大江书铺出版,1928年12月10日初版,1929年6月1日再版,1932年9月10日第3版

##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片上升著,鲁迅译,大江书铺出版,1929年4月1日初版,1930年2月1日再版

## 《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

弗理契著,冯雪峰译,大江书铺出版,1930年8月10日出版

从收藏角度看,这套文艺理论小丛书的收藏难点在于:首先,全套收藏并非易事,尤其是《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殊不易收集;其次,初版本集不易;第三,由于这套丛书采用的是民国时期最常用的木浆纸,时间一长,容易发黄发脆掉渣,因此品相上佳者难得;第四,版权页有版权印或版权票的相对少见。赵景深收藏的这套丛书5册齐全,且全是初版本,品相也属上品。另外,这5册书中,除方光彦译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没有版权印外,其余4种均有版权票或版权印。

赵景深的购藏在当年就颇具特色。抗战时期曾流传一句话:“倘若你需要一本市面上不大看见的中国新文学书,那只要去向赵景深借好了。”不过,1930年之后,赵景深的兴趣转向中国小说戏曲方面,藏书重点也随之转变,书架上“全是些文学史、文学理论或古代的诗文总集之类”的图书,新学版本收藏就此搁浅。陈望道策划的这套文艺理论小译丛,就是赵景深收藏重心转移后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果之一。

本次展览将这套丛书展示出来,亦是希望通过它引出赵景深与陈望道的交往。赵景深保存着陈望道的小品文和漫画《美学概论》等多种著作,其中《美学概论》的前环衬有赵景深题字“本书为著者所赠,一九二七·九·一四”。由此可知,二人的交往可回溯到1927年9月。赠书时间距离出版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此时也正是赵景深从广东海丰来上海开明书店不久。另据林海东介绍,他自己收藏有1932年初版发行的《修辞学发凡》,内封有陈望道给赵景深的签名“景深先生指正,望道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

赵景深还在193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短文《陈望道》,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散文集《文坛旧忆》。文中提到1930年陈望道婚礼现场的一些细节:“他与蔡慕晖女士的婚礼,是愉快的一晚。当时来宾须自我介绍。他的三个复旦大学的同学自己介绍,尤为特别有趣,至今我还记得。”由此可知,陈望道结婚时邀请了赵景深。

我们通过赵景深藏书中包含的诸多历史细节,可大体窥见赵景深与文艺界学界的交游。希望这部分展品的介绍,能抛砖引玉,引起今人对赵景深藏书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作者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员)

文汇报  
学人  
第544期

## 康有为游记中的牛剑诸校花名册

■ 王丁

康有为在流亡海外的岁月里,曾走访过很多高等学府,包括剑桥、牛津,并在游记中详细开列名目。康有为使用他的真正母语粤语作为音译词的音值标准,所创的译名对不通粤语的读者是一个阅读障碍。现将他的这两个清单略注如下。

## 剑桥大学

蓝布烈往(Cambridge)廿三校,而其大而古者旧有名者十余校,若王校(King's College)、雷士校(Gonville & Caius C.)、噶马岩路校(Emmanuel C.)、伽亚校(Clare C.)、色啤校(St. John's C.)、屯地校(Trinity C.)、耶稣校(Jesus C.)、女后校(Queen's C.)、割顿校(Girton C.)、嫩嫩校(Newnham C.)、而边布碌校(Pembroke C.)、彼得广校(Peterhouse)尤黠黑而旧矣。(康有为《英国游记》,岳麓书社,2016)

“彼得广校”这个名目棘手。康有为在后文又说:

蓝布烈往凡二十三名校合为一大学,学生凡三千人,校至大者容七百人,有新

有旧,而彼得教士校最古,阅三百年矣,墙基旧黠黑。此校藏书楼尤古,已四百年,深长廿丈,书左右列,凡十二万卷,有高宗《耕织图》存焉。(《英国游记》,康有为《牛剑诸校游记手稿》)

根据建立年份推测,剑桥的Peterhouse或许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彼得广校”“彼得教士校”,不过两个译名都是不准的,“Peter”彼得在House的走形了。“广”也许是“唐”的误识,唐即庙。Peterhouse的确附设一座小教堂(Chapel),建于1628年。“彼得教士”凉就是Peterhouse,教士跟庙不可能有对音关系,可以推测是“致士”之误书,“致”粤语广府话发音[hau2],加上“士”[sɨ6],恰好合上英语house的发音。

## 牛津大学

光绪三十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康有为对牛津大学进行了一次四日游:

恩士弗(Oxford)廿一校……啤料校(Balliol College)开创至古而学人至多,今犹然。袄祠校(Christ Church),边卜碌校(Pembroke C.)、窝牛士打校(Worcester C.)、色啤校(St. John's C.)、波料校(Balliol C.)、推拿地校(Trinity C.)、嘘士打校(Exeter C.)、耶稣校(Jesus C.)、临窺校(Lincoln C.)、卑理顺那校(Brasenose C.)、敦伯来校(Keble C.)、噶佛校(Hertford C.)、新校(New C.)、玛地各校(Magdalen C.)、女后校(The Queen's C.)、大学之校(Uni-

versity C.)、苏校(All Souls C.)、阿料校(Oriel C.)、可要士伽士地校(Corpus Christi C.)、玛利顿校(Merton C.)、免士非路校(Mansfield C.)、免奢士打新校(Harris Manchester C.)、《英国游记》

康氏做的牛津各学院表单,译音词可以完整复原。用“袄祠校”译Christ Church,很有意思。袄教(Zoroastrianism)本为波斯胡人信奉的宗教,康有为使用这个古词,借以表达是蛮夷之教,避而不用天主教基督,颇有意味。康有为在提及西洋教堂时经常使用这个译法,但康有为游记的多种整理本屡屡隶定为“袄”(注意袄、袄两字的右边,有天、天之别),应该改正。

康有为的译音有一大特点,就是他全面使用粤语音,除了当时已有通行译名,且他又了解的词,如“耶稣”等。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剑桥、牛津均有一所,康分别译“屯地校”“推拿地校”,都不太准,[rɪ]音节是汉语音译的老大难问题(比较Tracey“翠喜”,借用[ts]作为替代解决)。有的对音选字颇具匠心,如边卜碌校(Pembroke C.),所选边卜碌的粤语音[bin1 buk1 luk1],很贴近原语发音。Pembroke是伦敦的一处大庄园,清末使西外交官已有提及,“滇布洛得吧”“偏布禄罗址”见于郭嘉焘、刘锡鸿的记录(参拙作《大清钦差会见童年罗素记》,《读书》2022.1),拟音均不及康有为之准。

在嫩嫩校(Newnham C.)一名,以嫩[nyn6](从Newn,简直不能更名),以“啤料校”(Balliol College)的第一个音节Ba,英语发音是[beɪ],用“啤”正好,懂广东话的人知道“啤酒”也是发[beɪ]音的。有点格外好听的“啤”这个字在当时新造出来不久,从口,表示是外来语、音译词,单声,专门用来指代西洋的“啤酒”(英语Beer,德语Bier)。他第二次著录Balliol C.,换了一种音译“波料校”,第一个音节有变,似乎是受了粤语习惯把Balliol译为“波”的暗示(无独有偶,同为舶来品的扑克牌poker,在香港有“破牌”“啤牌”两个译名,译音用字的摇摆情况类似)。同一个名字重出别译,也许源于几个助手之间没有协调定稿;类似的情况在康有为海外游记中并不罕见。康有为为自己不懂外语外文,西游时的语言拐棍主要依靠留美的二女儿康同壁、门生罗昌,而罗生本人也是粤籍人士,当时正在“恩士弗大学”留学,后来娶了康同壁,成为康门女婿。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